

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探究

——兼析澳門的經濟政策

謝四德*

政治與經濟二者是分不開的，所以才有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政治如何影響經濟？權力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公共經濟學都有論述，但較少有針對政治改革對經濟發展的一種邏輯性論述。這顯然是理論上的局限或排斥，因為時至今日，世界仍存在太多的不平等。例如，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為何美國發展如此發達？為何拉美國家如此落後？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何中國社會已走向小康？為何北韓社會仍飽受飢餓？為何在全球一體化下，經濟總量不斷增加反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而西方經濟學總是歸咎於市場失靈、政策失靈或落入經濟週期陷阱的解釋，我們不得不質疑這種理論解釋的局限性。這促使我本人思考一個問題，經濟學理論是刻意避開政治因素解釋，目的是不讓政治干預自由市場。無獨有偶，西方最早期經濟學著作大都以政治經濟學命名，直至 19 世紀末開始“政治”二字被刪掉，著作以純經濟學命名，而這個時期剛好是世界確立了資本主義體系。本文認為，今天的世界不平等很可能是由於忽視政治改革等因素所致，故嘗試闡述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考慮到政治的複雜性且具有顯性、隱性的特點，本文針對權力尋租前提下，討論政治改革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內在邏輯。

一、政治改革的內涵

所謂政治，泛指眾人之事。改革的本質是追求先進的生產和公平合理的分配，應從生產方式與交換方

式中尋找。¹ 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新調整²，是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之間反覆博弈之後的產物³，也是落後國家追趕的途徑⁴。將政治與改革串聯就是政治改革，簡而言之，通過改革解決眾人之事。理論上，從廣義看，任何決策性的改革都具有政治性，都視作政治改革；從狹義看，指統治階級根據社會矛盾狀況，為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在現行制度不變下，通過權力再平衡和再供給，調節政治關係，完善政治功能，其實質是政治制度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⁵，一種不徹底的改革⁶。

二、政治與經濟二者分不開

從學術文獻看，西方早期不少經濟學著作是以政治命名的。如 1844 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690 年配弟的《政治算術》、1803 年法國庸俗經濟學家薩伊(J. B. Say)的《政治經濟學概論》、1821 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經濟學綱要》、1848 年約翰·穆勒(J. S. 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71 年英國傑文茲(W. S. Jevons)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4 年法國瓦爾拉(Léon Walras)的《純粹政治經濟學》、1859 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等，儘管研究圍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方面為主，但當中不乏帶有慎密的政治思維邏輯。例如，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指出“不論何處、不論何時，國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與勤奮總是成正比例的，財富就隨着這些因素而增進而減退；但是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級助理研究員

個人的勤奮與儉約、創造與進取，如果沒有內政上的自由、適當的公共制度與法律、國家行政與對外政策，尤其是國家的團結和權力這些方面的支持，就決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成就。”⁷ 當中提及的內政上的自由、適當的公共制度與法律……這正是政治改革的要核，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如果沒有這些政治改革，個人要想通過自身努力、創造取得成就談何容易。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配弟在《政治算術》也指出“貨幣不過是政治身體的脂肪。”⁸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論證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同時強調生產力的最根本作用。筆者發現，馬克思與配弟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看法不同，前者強調生產力，後者強調政治。可見，早期西方經濟學著作反映出政治、經濟二者分不開。然而，自 19 世紀末，隨着資本主義制度已牢牢地取得世界統治地位，確立資本主義世界政治體系，政治經濟學走向純經濟學發展，不少廣泛影響力的經濟著作已不用政治命名，例如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道格拉斯·諾斯的《制度、制度變遷及經濟績效》，研究方向由社會經濟矛盾走向實證、量化分析。馬克思曾批評這是政治經濟學庸俗化表現。有研究認為這種情況表明資產階級在其居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下已經掌控了自己和社會的命運，並具備了充足的經驗和常識，不需要像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那樣仰仗經濟學家指導他們如何建立制度和體制，怎樣進行積累和管理了。⁹ 政治經濟學走向了純經濟學，這是資本主導世界格局的必然選擇選擇。純經濟學的發展與全球化輸出，直接地把政治、經濟之間相互影響割裂開來。然而，理論上的割裂開來不等於客觀上也割裂開來，歷史的發展規律一再證明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¹⁰ 伍裝運用權力經濟學分析指出，一般來說，在權力經濟社會中，政府權力處理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原則是，在非常規時期，經濟服從政治，因為政治權力基礎直接關乎政府權力的存在和生命；在常規時期，政治服從經濟，因為政府權力的政治基礎最終要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同時強調打破國家競爭力“鎖進”狀態的途徑在於進行經濟和政治改

革。¹¹ 王麗萍認為，就政治與經濟關係而言，政治不僅是經濟增長重要的外部環境，而且政治本身是深度介入經濟過程，介入經濟增長過程的重要因素。¹² 胡聯合、胡鞍鋼認為“政府只有不斷推進改革，進行制度創新，使政治體制不斷適應變化的客觀世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¹³ 董成雄、王四達以古代商鞅變革說明社會改革在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是解決社會矛盾、推動社會進步的有效途徑。¹⁴ 孫忠良說，中國在經濟領域改革成功的背後，從未離開過政治改革的支撐。¹⁵ 斯蒂格利茨指出“如果要使經濟改革得以採納，必須要在它之前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¹⁶

三、經濟發展困境的政治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¹⁷ 同樣是改革家的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也指出“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現實的政治領導，那就不可能談到經濟發展。”¹⁸ 從逆向反推所得，經濟困境有可能與政治問題有關。由於本文的探討性假設，推斷出權力尋租導致經濟發展困境。

(一) 權力尋租如何導致經濟發展困境？

其中一種可能性：由於權力尋租導致政府政策發生無效率。政府政策無效率最常見的衝擊有兩方面：一是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它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這裏所指的市場失靈是由政策無效率造成，政策出台最終發生該干預的不干預，不該干預的盲目干預，使自由市場下的價格機制無法自由調節、分配，在信息不對稱下，影響供求平衡，擾亂生產秩序，最終阻礙經濟增長；其次的是市場失靈會促使強大廠商混水摸魚，利用政策無效率的偏向性獲得市場壟斷地位。二是社會分化。理論上，

社會分化是由專業分工產生，然而，政策無效率不但將經濟成果通過改革轉化為社會福利水平，相反會加速社會分化。可以說，政策無效率不但會削弱經濟增長，而且也促使社會分化，形成經濟發展困境。

(二) 政策無效率如何產生？

即使精英政府也有可能發生政策無效率，然而，如果政策持續發生無效率，它很大程度上與權力尋租有關。尋租(rent seeking)，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利益論中的不可或缺部分。它有其他叫法，如卡特爾化、壟斷化或尋求非直接生產性利潤(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也有合法尋租和非法尋租之分，合法尋租是指通過遊說以爭取政府的政策傾斜，非法尋租是指通過行賄等違法方式取得壟斷特權。尋租的本質是壟斷化過程¹⁹，在《現代經濟辭典》被定義為政府官員、企業或個人憑藉特殊的壟斷地位或特殊手段追求超常經濟利益的行為。²⁰ 1966年，萊賓斯坦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論文《配置效率與 X-效率》，提出了 X-非效率理論，當某一產業內企業數量越少，市場壟斷力量就越大；當壟斷企業在不存在市場競爭機制約束的狀況下，就會放鬆內部管理和技術創新，從而導致 X-非效率。1967年，戈登·塔洛克(Gorden Tullock)在《西部經濟雜誌》發表《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提出如果“沒有政府幫助的私人集團除了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外，別無他途獲得壟斷。從供給角度看，廠商希望通過市場壟斷獲得價格控制權，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從需求角度，權力個人希望通過權力謀取私利。尋租正是構成供需的均衡點。

(三) 為甚麼權力個人願意冒着失職或犯法的風險制定出政策無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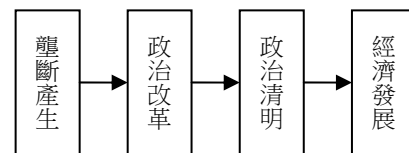
其中一個最大可能性：權力慾望，利慾薰心。荀子“今人之性，生而好有利焉。”²¹ 司馬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²² 霍爾巴赫在《自然政治論》中認為“人們聯合起來是為了滿足本身的利益。”¹⁷ 17世紀英國唯物論者霍布斯認為“對於每一人，其目的都是為着他自己的利益。”²³ 利益支配着我們的一切決定。²⁴ 權力經濟學將此歸咎於權力慾

望，制度經濟學將此歸咎於成本—收益的計算。

四、壟斷下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

綜上所述，因為尋租、政策無效率、壟斷，所以導致經濟發展困境。其中一種可能性，經濟發展困境的鎖進是權力與市場結合產生既得利益壟斷。如果真的發生這種壟斷狀況，那麼，要對症下藥的話，從政治改革入手是不可或缺。本文嘗試闡述既得利益壟斷、政治改革、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圖 1)

圖 1 權力資本壟斷下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



(一) 既得利益壟斷

“壟斷”的最早用例見於《孟子》，明代以後“壟斷”逐步取代“隴斷”，意為“把持和獨佔”。²⁵ 當今，壟斷泛指一種經濟現象——一種完全排斥競爭的市場結構。²⁶ 理論上，基於經濟人假設，只要有生產活動、在利益動機驅動下，壟斷隨時有可能發生。如果既得利益壟斷涉及權力尋租，學術上稱權力資本壟斷，或是權力資本的市場壟斷行為，權力尋租是壟斷的關鍵。從性質上看，既得利益壟斷是政治腐朽的產物，是資本凌駕政治下權錢交易的結果。列寧也認為，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引起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馬歇爾對於壟斷的效率特徵是持不能定論的態度的²⁷，一方面，他認為壟斷者追求純收入最大化，供給價格小於需求價格，因而經濟不會自然達於社會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壟斷經營能夠獲得大規模生產所帶來的各種經濟，因而不一定是壞事。之後被理解為“馬歇爾衝突”。然而，並非所有既得利益壟斷都是負影響的，如科技創新產生的市場屬於正影響的。在邏輯上，如果既得利益壟斷涉及權力尋租，它必定產生負

影響，長期存在會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社會因分配不均、矛盾對立，將倒逼政治改革，重新分配利益。正如黑格爾認為“熱忱、熱情”是一種以私人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²⁸ 馬克思也認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二) 政治改革

如果發生政策無效率與權力尋租和既得利益壟斷有關，那麼，要使政策回歸有效率狀態，它必須通過政治改革，方能使權力回歸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目標上，這也是倒逼政治改革的根本訴求。如果既得利益者想避開政治改革，只考慮經濟改革，從政治與經濟分不開看，短期政策可能發生有效率，長期仍回歸政策無效率的狀況，理性將促使社會發起更大的倒逼政治改革聲音。如果既得利益者堅持不推行政治改革，那麼結果是被革命推翻(馬克思的觀點)。歷史一再證明，封建皇朝的終結，根本是無視政治改革的風險。正如伍裝在《權力經濟的發展邏輯》指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生權力資本壟斷時，社會上發生利益矛盾與對立將迫使政府權力利益集團推行政治改革；如果不推行任何的政治改革，意思是既得利益集團不能通過調整和改革克服自身的慣性，那麼，它就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擴張方向，也不能代表廣大市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使得政府權力利益集團的政治基礎趨於瓦解。²⁹ 在邏輯上，不排除有一種可能性：既得利益集團的保守力量中會派生出新的改革力量，在審時與利益驅動下，改革派的政見供給與社會需求達致耦合時，將構成新的國家政治力量。一旦新的國家政治力量主導政治改革，它有兩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是在打破既得利益壟斷前提下，短期改變政策無效率狀況；二是在打破既得利益壟斷前提下，長期改變政策無效率狀況。當發生第一種情況時，新的國家政治力量有可能重蹈覆轍，成為新得既得利益壟斷集團。社會倒逼政治改革的博弈將再次上演。

(三) 政治清明

從邏輯上看，一個進步、理性的社會，不但要求政策有效率，而且要防止政策無效率發生。它必須防

止權力尋租行為發生，要做到這點，就要確保政治清明。其次，社會倒逼政治改革的博弈如果不斷重覆上演，它將使國家產生內耗和難以估計的發展機會成本，這也可能促使社會要求政治改革→政治清明的一步到位。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存在。呂元禮在《新加坡為甚麼能》³⁰書中論述了新加坡從一開始要求在政治改革→政治清明的一步到位，並有力地指出政治上之所以長期保持活力，其根本原因是鐵腕反腐與高薪養廉促使下的政治清明。政治清明，並非是學術上用語，但屬於中國的文化產物。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清明”一詞最早出現在政治上是《詩經·大雅·大明》：“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康熙的正大光明，近代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當代胡錦濤的“以民為本”、習近平的“依法治國”，其治國理念與政治清明一脈相承。政治改革是否必然遞進至政治清明？新加坡顯然是個別例子，世界上仍有好多國家周旋政治改革的漩渦中而不能自拔，所以答案是不一定。這既取決於政治家的道德水平和思想意識，也取決於權力產生的制度環境。如果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更多的取決於政治家，權力相對集中結合政治家的道德水平和思想意識，使它有條件實現政治清明，如秦代的商鞅變法、唐代的貞觀之治、習近平的反腐反壟斷等；如果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其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本身已具有約束權力，實現政治清明的條件，並非在這種制度下就等於政治清明，所以一旦發生政治貪腐，更多於取決於法制改革。假設上述兩種制度下同樣發生既得利益壟斷問題，應該說，權力相對集中的制度設計會較有效率走向政治清明，如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但上層政治不清明且時有發生。儘管答案不一定，但本文仍然認為政治清明仍會通過政治改革得以實現。不論在社會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只要有政治家的出現，都會在政治產生實質的影響。

(四) 經濟發展

理論上，政治環境可以影響經濟發展，這是政治經濟分不開的解釋。當發生政治清明時，毫無疑問，它將有條件促使經濟發展。當政治清明的時間越長，那麼對經濟發展的正影響越深，反之亦然。從邏輯

看，第一：政治清明可減少因尋租而產生的政策無效率，當政策無效率發生減少，那麼，政策就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第二，政治清明能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可以確保政策不傾斜，從而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有利提升營商指數。第三，政治清明能防止權力尋租產生的市場壟斷，經濟人想創造壟斷性利潤，只能通過科技創新。第四，政治清明能增加信息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信守契約和私有產權保障，產權制度得以保障，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第五，政治清明能促進企業家精神，一旦企業家精神集聚，新經濟增長點將隨之而來。一個典型的例子：新加坡正是因為李光耀對政治清明的捍衛決心，使新加坡成為全球營商環境名列前茅的城市，而新加坡只花了 20 年就由一個貧窮落後的地方變成亞洲四小龍。

(五) 小結

綜上所述，其內在邏輯大致為：既得利益壟斷倒逼政治改革；政治家深化政治改革以實現政治清明；政治清明能減少因尋租而產生的政策無效率，能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能防止權力尋租產生的市場壟斷，可以增加信息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信守契約和私有產權保障，產權制度得以保障，能促進企業家精神。最終影響經濟發展。

五、結合澳門經濟政策的思考

無可疑置，政治經濟分不開是客觀存在。本文在此基礎上把它們邏輯化，內化至既得利益壟斷、政策無效率、經濟發展困境、政治改革、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的概念串聯上。通過內在邏輯的梳理並針對一些問題作出逆向思考：為甚麼世界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世界不平等不斷加劇，是甚麼原因造成？此外，如果發生權力支配的壟斷，如果不從政治改革切入解決，它是否有效率？這不算是創新性的分析，因為不少文獻已論述了壟斷與權力尋租的關係、尋租與政策無效率的關係。本文所做的是，假設權力尋租前提下，把政治改革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有序地串聯起來。其現實的意義在於分析經濟發展困境時，不再

片面地接受經濟理論的解釋、不再順從於西方經濟學對政治因素不變的假設，而作出有限度突破性思考，政治很可能是影響經濟發展困境的因素，更可能影響我們該有的發展權利。

如果將這些邏輯理論套在澳門分析，主要看澳門有沒有發生政策無效率？如果有，我們再探討其原因。

(一) 澳門有沒有發生政策無效率？

應該說，任何政府政策都有可能發生無效率，問題取決於政策有沒有迅速糾錯，如果沒有迅速糾錯並放任無效率長期存在，這可界定為政策無效率。本文將從經濟領域中探討幾個核心政策的無效率現象。

第一，產業政策。2002 年，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策略，至今將 17 年。回顧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曾提出以下產業發展策略：會展業(2002)；離岸服務、物流、中藥(2003)；製造、離岸服務、中醫藥、環保中介(2004)；傳統工業升級轉型(2005)；中醫藥、航空物流、商務中介服務(2006)；會展、文化產業(2007)；傳統工業升級轉型、會展、文化產業(2008)；會展、文化產業(2009)；文化產業、中醫藥、物流、教育(2010)；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商貿服務、高附加值工業(2011)；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商貿服務、傳統工業升級(2012)；飲食、會展、中醫藥、文化創意(2013)；會展、文化創意、中醫藥產業、信息科技、物流(2014)；文化創意、中醫藥、環保產業(2015)。嚴格來看，上述發展策略都沒有效率的，原因是這些產業至今都沒有被納入政府正式的統計中，這預示着這些產業不具備用於統計的實質產出(即沒有產值可計算)。至於傳統工業升級方面，製造業產值比重由 2000 年的 0.09 下跌至 2014 年的 0.005。無論是新興產業或傳統產業升級，都沒有實質的產值能夠說明特區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存在有效率。

第二，博彩業及其監管政策。博彩業是澳門的龍頭產業，一直備受關注。由於博彩業的特殊性及其一業獨大的風險，學界對此早有研究並認為，博彩業獨大蠶食其他產業的發展(industrial cannibalization)³¹和擠佔人力資源和外資投放其他行業³²，也有指空間狹

小嚴重約束了澳門可選擇的產業領域³³。博彩業一業獨大：從產出法看，2000年博彩業的產值為澳門幣112.6億元，佔總產值的27%，2014年的產值澳門幣2,391.95億元，佔總產值的59.56%；博彩稅：由2002年的澳門幣77.65億元升至2012年的澳門幣1,133.77億元，升幅高達14.6倍。其中2012年的博彩稅佔特區政府整年財政收入高達87.55%，形成博彩財政。博彩監管方面：①反洗錢。2005年美國指控澳門滙業銀行涉嫌協助朝鮮洗黑錢；2007年，亞太地區反洗錢組織公佈的一項評估發現，澳門的反洗錢政策與國際認可的多項反洗錢措施不符。³⁴ ②博彩中介活動。2014年4月發生的“黃山事件”，一名與澳門金麟貴賓廳的有關人士黃山欠下近一百億元的爛賬；2015年9月發生的“多金事件”，永利澳門有限公司旗下的多金貴賓廳因賬房總監周玉媚涉嫌欺詐5.2億港元；2016年1月6日凱旋門娛樂場貴賓廳一名高層職員涉吞款近億等等，事件不但涉及商事欺詐，而且牽涉非法集資。另外，有關博彩中介涉嫌非法放貸及非法禁錮等問題，在報紙上屢見不鮮。或許有人認為博彩業產值增加顯示政策不存在無效率問題。本文認為，針對博彩業政策是否存在無效率的界定應該體現在政策是否有效使博彩業的特殊性影響在合法化前提下走向合理化。而博彩業涉及洗黑錢屬於不合法，博彩業一業獨大擠佔其他產業發展屬於不合理，政策未能有效阻步博彩業洗黑錢及其擠佔效應，顯然是政策無效率的表現。此外，由於博彩業的特殊性，其性質決定政策監管效率，顯然，一連串的非非法集資、商業欺詐、高利貸和非法禁錮等，顯示監管政策無效率。

第三，樓價及住屋政策。政府政策的終極目標是安居樂業。由表1可見，私人房屋價格由2004年的澳門幣2,432元/呎到2015年的澳門幣50,564元/呎；居民月工作中位數由2004年的澳門幣5,167元到2015年的澳門幣15,000元。比較之下，2004年的樓價與月收入中位數之比為1:2.1，2015年的樓價與月收入中位數之比為3.3:1。此外，樓價飆升20.8倍，而居民月收入中位數僅升2.9倍，數字反映澳門居民的收入水平遠遠被樓價飆升拋離，脫離購買力。2012年，政府出手干預樓市，俗稱“劉八招”³⁵。然而，政策水過鴨背，沒有檢討，也沒有遞進，更沒有加強，

可以說，對抑制樓價毫無作用。每逢五一勞動節，不少社團上街示威表達上樓難訴求。政府轉向19,000公屋政策回應住屋難訴求，行政長官崔世安明確19,000公屋將於2012年底竣工，結果至今仍未達標，政府解釋沒有土地供給。其中一個原因是大量土地在回歸前被私人屯積，2011年政府點算出113幅未發展完成的土地，根據新《土地法》，其中48幅可歸責於承批商，其中22幅已宣佈批給失效，但不等於政府手上立即有地，這最終取決於承批商的法院上訴結果。樓價飆升，住屋難涉及政府兩方面政策無效率，一是政策干預無效率；二是土地管理無效率。客觀上，政府有條件制定有效率政策，因為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下，《澳門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高度集中的權力。所以這不是客觀因素構成的政策無效率。

表1 私人房屋平均呎價與月工作中位數(澳門幣)

年份	私人樓平均呎價	月工作收入中位數	樓價/中位數比例
2004	2,432	5,167	1比2.1
2015	50,564	15,000	3.3比1

(二) 澳門經濟政策無效率的原因？

理論上，如果經濟政策發生長期無效率，可能受到權力支配，也可能是市場支配。從澳門的產業政策、博彩業及其監管政策、樓價及住屋政策發生無效率來看，我們基本上可以排除市場支配因素。因為澳門不具備市場支配的條件。第一，澳門只是一個29平方公里住有65萬人口的特別行政區，人才短缺、市場狹窄、土地資源貧乏，也非金融中心，更非工業基地，這些客觀因素基本上可以界定為市場不可支配的條件。即使博彩業一業獨大，其影響雖深入至政府財政、立法會及社會福利，其力量雖大但也不足以抗衡政府政策，因為賭權由特區政府支配，賭客由中國市場支配。第二，儘管澳門奉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但實踐的是行政主導(《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干預市場是必要的。即使有些市場特區干預不了，但在“一國兩制”的委託代理制度下，社會主義制度干預力量足以確保特區政府的干預到位。可見，澳門不存在市場支配因素。排除市場支配因素之後，剩下就是政治因素——權力支配。在“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下，特別行政區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行政主導安排，具體反映在行政長官對各級官員的任命、授權等規定。顯然，這些制度安排本質上就構成權力支配。所以，不排除澳門經濟政策長期發生無效率是政治因素所致。而這種政治因素的一種可能性是權力支配產生的權力尋租，意思指上層建築因尋租而通過權力支配使一些經濟政策發生長期無效率。儘管這是一種可能性的假設，但結合 2007 年工務運輸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和 2016 年的前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涉嫌利益輸送看，澳門特區政府上層建築的確存在

權力支配發生權力尋租問題。至少可以認為樓價與住屋政策長期發生無效率與政治因素中的權力尋租有關；至於產業政策和博彩業及其監管政策的無效率，它們也是政治因素影響所致，但是否權力尋租所致？由於沒有相關案件說明，故本文不能推斷這是權力尋租的結果。但也無法從經濟學理論解釋，為甚麼澳門特區政府具有財政豐裕的比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經過將近 17 年，仍未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目標？

註釋：

- ¹ “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24-425 頁。
- ² 王偉光：《利益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430、438 頁。
- ³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 年，序言 II。
- ⁴ “狹義而言，現代化不是一個自然的社會演變過程，它是落後國家採取高效率的途徑(其中包括可利用的傳統因素)，通過有計劃地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超上先進工業國和適應現代世界環境的發展過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 ⁵ 劉吉發：《政治學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87 頁。
- ⁶ 《大辭海》(政治學、社會學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年，第 6 頁。
- ⁷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北京：商務出版社，1961 年，第 98 頁。
- ⁸ 斯坦利·L·布魯：《經濟學思想史》(第 6 版)，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年，第 23 頁。
- ⁹ 劉永佶：《論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社會經濟矛盾中的內在統一》，載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 年第 11 期，第 35 頁。
- ¹⁰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 年，第 259 頁。
- ¹¹ 所謂權力經濟是指一種權力(國家權力、政治權力或政府權力)構成了一個社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並左右着經濟運行方式、經濟發展及其動力機制的一種經濟形式和經濟形態。伍裝：《權力經濟的發展邏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5、51、264 頁。
- ¹² 王麗萍：《尋求繁榮與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86 頁。
- ¹³ 胡聯合、胡鞍鋼：《繁榮穩定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 年，第 391 頁。
- ¹⁴ 董成雄、王四達：《商鞅變法的現代啟示》，載於《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71 頁。
- ¹⁵ 孫忠良：《後危機時代中國模式政治改革》，載於《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4 年第 1 期，第 24 頁。
- ¹⁶ 同註 10，第 256 頁。
- ¹⁷ 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6 頁。

- ¹⁸ 新加坡聯合早報編：《國家成功的要素》，載於《李光耀 40 年政論選》，1994 年，第 135 頁。
- ¹⁹ 肯尼士·J·柯福、大衛·C·柯蘭德：《馴服尋租者》，見[美]大衛·柯蘭德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尋租和 DUP 行動分析》，長春：長春出版社，2005 年，第 219 頁。
- ²⁰ 劉樹成主編：《現代經濟辭典》，南京：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29 頁。
- ²¹ 《荀子·性惡篇》。
- ²² 《史記·貨殖列傳》。
- ²³ 霍布斯：《利維坦》，載於《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年，第 667 頁。
- ²⁴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年，第 457 頁。
- ²⁵ 李艷：《淺議“壟斷”的詞義演變》，載於《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12 年第 6 期，第 13 頁。
- ²⁶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十四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 444 頁。
- ²⁷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陳良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²⁸ 黑格爾：《歷史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56 年，第 62 頁。
- ²⁹ 伍裝：《權力經濟的發展邏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51 頁。
- ³⁰ 呂元禮：《新加坡為甚麼能》，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 ³¹ 王五一：《澳門博彩業發展》，載於郝雨凡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08-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 55 頁。
- ³² 陳文鴻、鍾民傑：《澳門經濟結構優化及在珠三角都會區的定位》，載於《當代港澳研究》，2009 年第 29 期，第 125-140 頁。
- ³³ 袁持平等：《澳門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63 頁。
- ³⁴ 亞洲電視對黃少澤的專訪，載於亞洲電視網站：<http://www.hkatv.com/>，2014 年 1 月 18 日。
- ³⁵ “劉八招”是指由當時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推出抑制樓市的八招。